



西南联大诗人群

史料钩沉汇校及文学年表长编

邓招华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西南联大诗人群

史料钩沉汇校及文学年表长编

邓招华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策划编辑:邵永忠 王建虹

责任编辑:邵永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南联大诗人群史料钩沉汇校及文学年表长编/邓招华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8

ISBN 978-7-01-016343-7

I. ①西… II. ①邓… III. ①诗歌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6428 号

西南联大诗人群史料钩沉汇校及文学年表长编

XINAN LIANDA SHIRENQUN SHILIAO GOUCHEN HUIJIAO JI WENXUE NIANBIAO CHANGBIAN

邓招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5.25

字数:410 千字

ISBN 978-7-01-016343-7 定价:6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西南联大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西南联大诗人群史料钩沉汇校》
(项目批准号 12YJC751014) 资助

河北省国家重点学科培育项目经费资助出版

代序 有“思想”的文献史料

中国新文学自1917年一路走来，浩浩荡荡，波澜壮阔。对百年中国文学发展历程的所有总结回顾，归根结底都属于“文献史料”的勘定和梳理，然而，“文献史料”究竟是什么呢？就是一些文字档案的汇集吗？当然不是。在我看来，所谓的史料，从来就不是一堆毫无生气的发黄纸册，因为，如何保存这些历史的文献，如何筛选这些陈旧的文字，又如何呈现这些曾经的思想，其中反映出来的恰恰是我们十分内在的“文学史观”。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献史料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文学史当代意识的深刻而特殊的表现。历史最终都是由今天的人来“书写”的，没有了“当下”，没有了“主体”，也就没有了被书写的“历史”。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应当承认，文献史料之所以能够成为有意义的文献史料，一个时代的人们或者重视这样的文献史料，或者重视那样的文献史料，其实都与这个时代人们的心灵体验直接相连，而思想理论常常就是人们心灵体验表达的理性形式。换句话说，绝对脱离当下心灵的“纯粹”文献史料的“价值”其实是不存在的，进入人们阐释视野的文献史料不可能是一堆与主观思想理论无关的干枯的材料。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在“学术规范”的追求中以尊重文献史料来反对思想理论，其实这本身就是某种思想理论的表达，我们其实是用一种“理论”反驳着另外一些我们并不喜欢的“理论”。当然，其中也包含着特定时代转换过程中学院派知识分子对自我生存需要的体认，包含着这一生存需要下的新的理性认识；同样，思想与理论表达也不可能没有自我支撑的“质料”的根据，“史料”就是我们思想与理论表达的“质料”，回顾20世纪80年代，在“理论”创新的高潮中，我们何尝又能够脱离开对新的“史料”的发现呢？拨乱反正、“重评五四”，在这里我们发现的是胡适在新文化运动、白话诗运动中的独特贡献；突破唯阶级斗争论的文学史模式，我们便重识了一系列被淹没的社团、

流派和作家。

如何在文献史料的发现中发掘出思想的深度而不仅仅是所谓的学术“规范”的建立，同时，如何让思想的推进保持与丰富的史料相互协调而不仅仅是“冷饭”的“新炒”，这恐怕才是我们今天要认真思考的东西。读着邓招华先生的关于西南联大诗人群史料钩沉的新著，我获得的就不仅仅是文献的补充和完善，而是关于文学研究的新的开拓的启示。

众所周知，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作家群（诗人群）的研究在最近一些年已经逐渐成为了学术的热点，但是，学术的热闹并不等于这一领域已经被开垦完毕，恰恰在一些基本的文献史料中，我们还一知半解，并没有完整的把握。邓招华先生没有将目光停留在那些理所当然的事实方面，而是沉下心来，做扎实学问，对西南联大诗人作全面系统的整理、辨析，这才有了放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厚重的《西南联大诗人群史料钩沉汇校及文学年表长编》，而且，更重要的在于，这些看似呆板的史料整理打开的是我们对于这一文学现象的诸多新的认识：西南联大诗人都是现代主义的吗？他们究竟还有哪些风格和追求？在祛除了对历史的本质主义看法之后，我们还可以从哪些方面打开研究的空间？读着这些文献的考辨，我们得到的却是研究思想的更广阔的激荡，这就是我所谓有“思想”的文献工作。在今天，我们太需要这样的史料研究者了。

我和邓招华先生并无交往，只知道他是魏建教授的高足，而在我们的现代文学界，魏建教授既有深厚文献功夫，又以思想的活跃闻名，我想，这或许就是招华于文献工作中思想的一个来源吧。按理说，序言由魏建教授一人完成才是理所当然的，我的旁观之论，完全是多余的，不过，招华却又以我和魏建教授交往多年为由索要这份读后感，我也不好意思推脱，那么，以上文字就权当是我一点不成熟的感想吧。

祝愿招华在学术之路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李 怡

2016年4月25日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前言 还原一个真实的诗人群体

作为 20 世纪 40 年代一个重要的学院诗人群体，西南联大诗人群近些年逐步得到学界的关注与重视，也取得了不菲的研究成果。不过，由于整体上拘囿于流派、社团的研究范式，有关西南联大诗人群的研究在取得显著成果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些缺憾。一个突出的表征是，当研究者过于拘泥于某一流派、社团，总是试图整一地寻求其整体特征时，也在某种本质化的追求中简化了历史，从另一个侧面掩盖了历史的复杂性。譬如，多数研究者倾向于将西南联大诗人群视为一个现代主义诗人群体，这种预设的流派阐释范式，在外延上仅将冯至、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王佐良等少数诗人纳入研究对象的范畴，极大地简化乃至遮蔽了历史。征诸历史实际，西南联大诗人群的诗歌创作形态是丰富多样的，既有早期卢静等人的浪漫之作，也有穆旦等人的新的诗艺探索，冯至等人对自我诗艺的转变与突破，还有后期以何达等为代表的新诗社等社团的朗诵诗创作。显然，西南联大诗人群的创作不是任何一种单一的流派主义所能囊括。而多数研究者将何达等后期联大诗人的朗诵诗创作排斥于研究范畴之外，无疑是对历史的一种暴力切割。这自然阻碍了对西南联大诗人群乃至 20 世纪 40 年代诗歌创作形态的深入研究。

某种意义上，流派研究重视线性历史叙事以及逻辑性“规律”的发掘，这种关于新诗发展的线性历史想象，更多的是一种知识谱系的自我建构，历史现场的空间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比这看似“完美”的叙事远为丰富。由于战争的外在的偶然因素，西南联大诗人群得以出现在新诗的历程中。这与其说是一种时间上的线性必然，不如说是一种空间上的偶然。而在历时性的线性流派研究范式之中，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新诗共时性的交错存在，从抗战前的“现代派”直接过渡到战后的“九叶诗派”，从而形成一个关于现代主义诗歌发展的完美叙事。在这种叙事“完美”的追求之中，人们简化地

将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纳入“九叶诗派”，在强求统一的本质化处理之中牺牲了历史的复杂性，而西南联大诗人群具体而多样的存在也被简化乃至被遮蔽。

如此，回到历史现场，呈示西南联大诗人群具体而丰富的存在样态，是深化西南联大诗人群研究的一个新的基点。这首先需要我们进入具体的历史语境，对西南联大的校园环境、文学讲授、师承关系、社团活动、刊物出版等诸多文学社会学多因素作出一个基本的历史描述，以期为介入、阐释西南联大诗人群具体的诗歌创作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亦是本书所致力方向。抛却流派研究范式浮光掠影式的概括性描述，本书从最原始最琐碎的材料入手，在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的爬梳、整理中，力图使西南联大诗人群的生成、流变等丰富多样的原始样貌呈现出来。从方法上说，本书大体上属于文学社会学的考察，将西南联大的办学理念、学校体制、课程设置、教学科研、社团活动、刊物创办，以及师生的衣、食、住、行等均纳入考察的范畴，以期通过历史细节的刻画和历史图景的复原接近文学历史的真实，使西南联大诗人群的整体存在与独特风貌得以完整而清晰的呈现。

之所以要将这些材料都纳入考察视野，并非为了书写一部西南联大校史，而是为了凸显西南联大诗人群具体而丰富的历史场景与时代语境。西南联大诗人群的诞生及其创作与大学教育、文学传播乃至政治运动等制度性因素纠缠在一起，这种文学社会学的考察视野对探讨西南联大诗人群来说不仅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深化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知识前提。深层次上，这也即是考察西南联大诗人群的生成及其创作与西南联大的校园活动、政治氛围、艺术追求等大学文化形态的互动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不仅有关西南联大的原始档案、史料汇编、回忆录等是本年表重要的基本材料，而且联大师生的日记、书信、回忆录等传记性材料，对考察西南联大诗人群的文学接受、艺术追求、创作流变等尤为重要。另外，当时的校园刊物以及西南联大诗人刊发作品的各种杂志与副刊，亦是考察西南联大诗人群具体创作的第一手材料。本书的撰写大体围绕着上述三类材料展开，并侧重于文学社会学的考察，以期在整体的历史脉络中凸显西南联大诗人群具体而多样的存在形态。

以往的流派研究范式侧重于文本的分析、阐释，这种将文学局限于“创作”的理解不无狭隘之嫌，更有甚者，多数研究者在流派阐释框架中，先在地将西南联大诗人群界定为一个现代主义诗人群体，进而以此剪裁历史，将

何达等为代表的朗诵诗创作排斥在外，这种本质化的追求是对历史的一种无理阉割。本书从文学社会学的层面切入，通过梳理西南联大后期政治氛围、学生运动、文学转向等资料，勾勒出以何达为代表的新诗社朗诵诗创作的缘起及状况。这对于突破固化的知识范式对历史复杂性的简化、遮蔽不无助益。整体上，西南联大诗人群可视为一个学院诗人群体。不过，学院空间、学院文化从来都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存在，而是一种具体的、现实的存在，并处于生生不息的变动之中。战争环境中的西南联大更是如此。西南联大这一学院空间，本身就是战争的产物，战争的影响以及诸多现实条件的制约显而易见。西南联大后期，随着社会现实的进一步恶化，校园氛围也有所转变，“左”倾思潮日益蔓延。在这日趋激进的社会文化思潮的刺激与影响之下，文艺社、新诗社等文学社团极力主张文学的社会功利性，新诗社更是积极提倡朗诵诗创作。对于何达、叶华、沈叔平、秦泥、沈季平等朗诵诗的创作者而言，他们的创作既是社会激进思潮的一种反映，也是西南联大校园环境、文化氛围转变的一个见证。这样，对于西南联大朗诵诗的发掘，并非意味着其艺术成就有多大，而是这种写作行为本身及其背后的文学立场，构成了我们理解、把握西南联大诗人群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有助于照亮以往为流派研究的简化叙事所遮蔽的层面。

这也警示我们，在指认西南联大诗人群整体的学院文化特征时不要掉进一个本质主义的陷阱。祛本质化是本书撰写的一个基本准则。尽管为了清晰地呈现西南联大诗人群的整体历史脉络，本书将芜杂琐碎的历史材料以时间为序进行了编撰，但是这种编撰不追求一种本质化的完美叙事。本书对史料的处理非常谨慎，关于史实的叙述亦少有某种公共的逻辑、目的论的预设以及毋庸置疑的必然性，转而呈现为历史细节的饱满及丰富的偶然性。本书关于西南联大诗人群的描述不是一系列连贯而成体系的故事，而是以具体、丰富的史料纪实性地再现其原始而多样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对史料的整理多是考证性的，以期以扎实的史料呈现历史的丰富肌理，在历史现场的空间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复现中，还原西南联大诗人群的真实存在。

对于本书的编撰而言，有关西南联大诗人群的文学材料都应该在考察的视野之内，由于时间等方面的限制，笔者只能尽量搜求相关材料。在材料收集方面“竭泽而渔”是一种学术追求和态度，实际上难以真正实现，本书亦难以穷尽所有材料，少许遗漏是无以避免的。对于材料的收集，本书首先查

寻第一手资料，一时难以查寻到的，则使用已有的研究成果来弥补。本书借鉴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2006）、《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姚丹，2000）、《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易社强，2012）等研究成果，对于其中的阙误之处亦进行了补正。由于笔者才力有限，阙误之处，尚祈方家不吝指正。

目 录

1937 年	1
1938 年	27
1939 年	68
1940 年	110
1941 年	149
1942 年	189
1943 年	215
1944 年	247
1945 年	281
1946 年	313
附录一 昆明《中央日报·平明》副刊西南联大诗人佚作	322
附录二 昆明《中央日报·平明》副刊西南联大诗人群诗作考察	340
附录三 《文聚》杂志及文聚社考释	355
附录四 知识学考古：“九叶诗派”再考察	368
参考文献	387
后 记	394

1937 年

1 月

本月 清华大学外文系二年级学生查良铮的诗作《古墙》《玫瑰的故事》，分别发表于北平《文学》第8卷第1期、《清华周刊》第45卷第12期，均署名“慕旦”。

按：同为西南联大诗人的王佐良（查良铮清华外文系同班同学）证实：“‘慕旦’两诗（注：含前一首《更夫》）是查良铮所作无疑。《更夫》（注：发表于《清华周刊》第45卷第4期，1936.11.25）是他的，《玫瑰的故事》也是他的。后者所据 L. P. Smith 所作 The Rose 一文，正是我们在 1935—36 年间在清华读的大一英文教科书中的文章”^①。据此，可知“慕旦”为查良铮早期笔名，《古墙》亦为其作品，虽然后来其以笔名“穆旦”为人们所熟知，并成为西南联大诗人群的代表诗人。

又《玫瑰的故事》有一短序，亦可与王佐良的证实相印证：“英国现代散文家 L. P. Smith 有一篇小品 The Rose，文笔简洁可爱，内容也非常隽永，使人百读不厌，故事既有不少的美丽处，所以竟采取了大部分织进这一篇诗里，背景也一仍原篇，以收异域及远代的憧憬之趣。至于本诗能够把握住几许原文的美，我是不敢断言的；因为，这诗对于我本来便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想起在一九三六年的最后三天里，苦苦地改了又改，算是不三不四的把它完成了；现在看到，我虽然并不满意，但却也多少是有些喜欢的。”

^① 王佐良 1989 年 11 月 28 日致李方函，转引自李方《穆旦（查良铮）年谱》，《穆旦诗文集（二）》，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49 页。

另，清华大学外文系课程，除了使学生能够“（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以外，另一个重要目标是“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故其课程设置及教学并不拘泥于外国语言文字的专门练习，而是以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的解读与赏析促进语言文字的学习。譬如大一英文课程读本：“精读英美模范散文，特重字句之用法，段之构造及章法”；西洋文学概要课程：“讲授欧洲文学史全部之大要，期使学生稔欧洲各国古今重要之典籍及文学之源流。演讲而外，并选取欧洲文学中之名篇巨制使学生阅读之”^①。穆旦《玫瑰的故事》创作深受英文课程的影响，可见，作为一名校园诗人，穆旦此时期的诗歌创作有着显著的学院文化特质。

本月 闻一多在艺专课堂上谈论到学生从军问题，“有人倡议学生从军抗日，但是一个学生的价值远高于一个士兵的价值，学生报国应该从事更艰深的工作才对。”^②

按：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不断挑起事端，侵占中国的意图日益明显。1935年，日本利用1933年5月签订的《塘沽协定》的有利条件，发起“华北自治运动”，威迫中国政府先后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10月4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提出将“华北自治”当作“帝国政策”的组成部分，力图攫取华北主权，进而侵占华北。这激起中国民众尤其是中国学生反日、排日运动的蓬勃发展。11月1日，清华大学等十所学校发表《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12月6日，平津15校学生自治会联合发出通电，反对“防共自治”。12月9日，“清华大学救国会”发表《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宣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③同日，北平学联发动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日本侵略的“一二·九”运动。

①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 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319页。

② 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37页。

③ 参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 下），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01—907页。

随后，北平多所学校学生发动罢课运动。

面对学生的罢课、救亡运动，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以校长梅贻琦的名义分别于12月10日、13日、19日、21日发布第207号、第208号、第209号、第210号通告，规劝学生复课。如第207号通告写道：“顷闻学生中有提议全体罢课者，如果属实，殊属非是。在此时局多故之际，诸同学应努力于实力之培养，切不可荒废学业，作无代价之牺牲，望各安心上课，勿得有规外行动，是为至要”。第210号布告写道：“查此次学生游行，虽属爱国表示，但爱国之道要在培植人才，做将来切实工作。诸君任重道远，来日方长，勿激于一时之气愤，忽视根本之训练，是本校师长切望诸同学注意者也。兹特再恳告诸君共喻此旨，即日复课，勿使学业久荒，是所至盼”^①。于此，可以见出以梅贻琦为代表的诸多清华教师对学生救亡运动的态度。在当时救亡运动日趋激烈的形势下，这种“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②的救亡观，似乎难以被当时的热血青年所完全接受，对部分激进青年来说，更是如此。1936年2月19日，清华大学甚至发生了因学生要求罢考而冲击教授会致使全体教授辞职事件，辞职宣言写道：

“同人等于本日下午开教授会讨论补行上学期考试问题时（注：因一二·九运动，上学期考试延缓），有学生多人声称代表全体学生，在外高呼口号，要求免考，继复包围会场，并有代表数人屡次冲入。同人等在此情形下既感行使职权之不可能，又愧平日教导无方，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国人。除向校长辞职外，谨此宣言。”^③

包括闻一多、朱自清在内的全体在校教授74人最后都签署了宣言。此事件后来在梅贻琦校长的努力下，始告平息。梅贻琦在签发的校长办公处通告中，布告学生：“以后且望体念时艰，力图共济，俾于风雨如晦之际，本校教学工作仍得负其鸡鸣不已之责任，以为国家民族在学术上

① 参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 下），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08—912页。

② 转引自黄延复、钟秀斌《一个时代的斯文》，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83页。

③ 《国立清华大学教授辞职宣言》，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 下），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14页。

延一线之命脉，是则本校同人所应共勉者也”^①。梅贻琦等清华同人在喧嚣复杂的境况中“为国家民族在学术上延一线之命脉”的良苦用心在在可见。闻一多在艺专课堂上的谈论也是此种良苦用心的体现。而后在战乱中，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西迁入滇、组建西南联大的壮举，正是此种“负其鸡鸣不已之责任”、以延学术“一线之命脉”精神的体现。

又，这种动荡的时代环境对校园内学生的影响、冲击是深远的。何炳棣曾叙及：“1935年12月爆发了如火如荼的‘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请愿、罢课、罢考使得任何人都无法专心读书。不幸我也被卷入校内的政治斗争”。并忆及自己当时同少数埋头读书的同学组成“同方派”，对抗清华救国会掀起的学生政治运动的过程，其中涉及搜查张学良和杨虎城津贴民族解放先锋队400元收据的事件。也对自己因此而被记两大过，“对加速衰老的父亲是一很大的打击”而难过不已。^②在联大诗人穆旦写作于1936年底的《生活的一页》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诸多学生内心的纠结、苦闷。文章由收到的一位“江南的朋友”来信所引发，“一种生活的景象燃烧在心里，为了这种缘故，我得到了不安。我用尽我的脑力使想我自己在现在的环境里得到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方法；或者说：我要一种充实的兴奋的生活”，“我想到了一个活的青年的使命，那是多么重大啊！而我们却是整日地怎样子过活呢？”“我愿意看到光明和黑暗交界的地方，我愿意时时张大我的视野，这种微温的生活是我所不能忍耐的。”^③

4月

6日 闻一多为彭丽天诗集《晨夜诗度》作跋。

按：闻一多在跋中称：“新诗在旁的路线上现在已经走的很远了……道上许太嫌冷落，所以这本书的出世，才需要我来凑凑热闹……当丽天初碰见我的时候，我对新诗还是热心的，自己热心作，也热心劝别人作。丽天之走上诗的道上来，总算是因为为的鼓励而感着更起劲的。不料把

① 转引自黄延复、钟秀斌《一个时代的斯文》，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88页。

② 参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4—90页。

③ 转引自易彬《穆旦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他（还有不少别的人）邀到了那里之后，为自己却抽身逃了。我之变节，虽有我的理由，但想起这些朋友们，总不免感着一种负心的惭愧。现在丽天愿意将已往的收获印出以告一段落，便为替自己赎罪计，我也不能不趁此说几句话。也许这是我对新诗最后一次插嘴的义务罢！”^①

又，闻一多自《死水》集以后，不再投入很大精力于新诗创作上，但其于新诗界的影响犹存。虽然闻一多在此坦言是其“对新诗最后一次插嘴的义务”，但是在后来的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被多个学生诗歌社团聘为导师，也积极指导、帮扶学生的诗歌创作，对西南联大诸多学生诗人影响深远。

6月

19日 清华大学第一二八次评议会决议，批准闻一多于1937年度在国内休假研究一年。^②

按：清华大学规定，服务时间满五年的教授，可以有一年休假，或出国考察研究，或在国内研究。如在国内休假一年，而不兼职，可得半薪。^③ 闻一多当年决定国内休假一年，着手编撰《诗经字典》的工作，并商定聘请中文系毕业生毕铎担任助理。后因战争爆发，闻一多取消了休假，赴长沙临时大学任教。

7月

7日 “卢沟桥事变”发生。

按：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师生并未意识到一场全面战争即将爆发。8日清晨，北京大学吴大猷教授听到稀稀疏疏的机关枪声，“以为是普通的打靶演习，当时并不在意”，按原定计划与饶毓泰、樊际昌、郑

① 转引自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38页。

② 清华大学档案室藏：《清华大学教师休假出国研究计划休假教师名单及来往函件》，转引自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39页。

③ 《专任教授休假条例》，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 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页。

华炽等同事前往西山野炊。胡适8日在家中对五六位北大教授说，这只是一次孤立的行动，不会带来什么影响。胡适也随即动身前往庐山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国是谈话会。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均前往庐山参加这次谈话会。^①10日，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秘书长沈履致电时在上海的梅贻琦校长：“连日市民、学校均镇静，各方安，乞释念”^②。

时清华大学一二三年级男生在西郊的西苑营房军训。这次北平大中学生集中军训由二十九军旅长何基沣主持。后因战事紧张，军训提前结束。据称，这些“正在西郊兵营军训的学生能够死里逃生，只能归功于教练撤退——而不是反抗——的决定”^③。西南联大诗人穆旦（查良铮）时为清华外文系二年级学生，参加了此次军训。穆旦1955年《履历表》“受过何种训练”一栏记载：“1937.6—1937.7 北平大中学生集中军训，由廿九军旅长何基沣主持，约有两个月。训练内容：军事训练，步兵操练。”^④

14日 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秘书长沈履在工字厅召集教授谈话会，沈履报告了连日来谒见北平市长秦德纯等所获信息，告知教授们日军决意吞并华北，大战在即。

按：同日，潘光旦、沈履急电身在庐山的梅贻琦校长，云：“和平绝望，战机已迫，盼急设法绕道正太平绥返校”^⑤。吴宓日记亦载：“阅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则（一）华北沦亡，身为奴辱。或则（二）战争破坏，玉石俱焚。要之，求如前此安乐静适丰舒高贵之生活，必不可得。我一生之盛时佳期，今已全毕。……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无论若何结果，终留无穷之悔恨。……当今国家大变，

① 参见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饶佳荣译，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② 《潘光旦、沈履致梅贻琦电》，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3卷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③ 参见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饶佳荣译，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④ 据穆旦档案之《履历表》（1955.10）。

⑤ 《潘光旦、沈履致梅贻琦急电》，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3卷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